

◀ (上接 8 版)

现我所拥有的文学与文本方面以及古文字学的分析技能。

我的指导教授给我提了一个“经典的”选题:研究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学者比鲁尼(al-Bīrūnī, 卒于公元 1048 年)的著作,他来自花剌子模,是一位精通物理学、数学、天文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博物学家。但是若要研究此项目,我需要一些基本的梵文和希腊文的知识,而这个任务在当时对我来说似乎过于艰巨。阿拔斯王朝(Abbasid, 750—1258)本身已经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朝代,更何况是被认为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学者比鲁尼了。

另一个“经典的”主题,即早期阿拉伯文化思想中的时间概念,则被另一位老师否定了。虽然我之前写过几篇关于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诗歌、《古兰经》与早期苏菲作品中意为“时间”的单词与词汇的学期论文,但我没有找到足够的材料,如一份核心文本或一组文本来论证一个有意义的主题。而且,对我来说这个主题似乎太抽象和无聊了。

弗朗茨·罗森塔尔荣休后加入了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他提到了在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里的尤尼尼(al-Yunini, 卒于公元 1326 年)的编年史也许值得一看。他的建议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他对世界各地图书馆中的阿拉伯文手稿十分了解,特别是在拜内克(在他的建议下,耶鲁收购了一些极具价值的物品)的,而且还因为他掌握了从“大局”分析问题的方法,即在更大而广的背景下确定某一特定文本的学术价值。

此外,他当时还正在研究答哈必(al-Dhahabī, 卒于公元 1348 年),此人是另一个主要的马穆鲁克王朝历史学家。罗森塔尔向我展示了答哈必的作品段落以及尤尼尼等人作品中与之相近的部分,并以此进行比较。(此事发生在计算机时代之前,因此罗森塔尔亲自誊抄了所有的材料)

在尤尼尼的编年史中,我发现了我所要寻找的东西:涵盖阿尤布王朝晚期和马穆鲁克算端国早期史料的最重要的编年史之一。尤尼尼的编年史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编年史的第二部分很少被研究,并且至今仍未发表(译者按:第二部分已于 2007 年在贝鲁特分三卷出版)。此编年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而且也在于其史学方面,因为它与埃及官方编年史在结构与内



带有马穆鲁克徽记的丝织品残片,15-16 世纪



清真寺油灯,玻璃制,饰珐琅及镀金,14 世纪,埃及或叙利亚

几何图案装饰的墙板,15 世纪,开罗

象牙雕刻(讲经坛装饰),13-14 世纪,埃及



容,甚至在语言和风格上都不尽相同,表现出“叙利亚学派”的奇妙特征。此书的存在还透露出在史学家间存在过一个非常亲密的网络,他们借此网络共享史料、轶事,甚至堂而皇之地相互抄录对方的著作。所以我决定选取其中五年(1297—1302)的纪事加以编辑和翻译,并写作一篇历史编纂学的论文。尽管只有两篇论文(耶鲁大学硕士论文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硕士论文)涵盖了构成我编辑并翻译的编年史部分基础的史料,但我设法查阅了所有现存的尤尼尼编年史手稿——共计 23 份,分别涵盖了不同的纪事年限,我借此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鉴于尤尼尼和他的叙利亚同代史学家间相互转抄的做法,我提议用“加扎里-尤尼尼传统”(Jazari-Yunini tradition, 两者共享文本内容)这一框架来讨论了此问题。我编辑并翻译的编年史部分还反映了另一发现,即其中的文本被分成两部分:尤尼尼编年史中的文本和那些来自加扎里(al-Jazarī, 卒于 1338 年)的不完整版本中

的平行文本。

因此我的工作包括:校订原始文本(“后古典阿拉伯语”)、考订编辑、译注,以及对散文(分别以古典阿拉伯语及其叙利亚方言写作)和诗歌(以书面语和口头语创作)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和背景研究。我的博士生导师古塔斯则不断批评锤炼我的研究和写作。虽然史学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但他对处理手稿的方法以及史料批判的精深造诣指示我以治学门径。

文汇报:您此后发表的三部著作虽然都是以语文学研究作为基础的,却又分别涵盖了俗文学(民间文学)、历史学和经济文书三个不同领域。这是否是随着研究深入而有意识地转换视角,还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而促成的?

郭黎:很有意思,你提到了这一点。简言之,我既是有意地,也是偶然地进入了这三个领域,答案就是“两者皆是”。

关于尤尼尼编年史与随后出版的专著(1998)是一个跳板,使我得以进入马穆鲁克史和历史编纂学的圈子,而这是

一个迅速发展的分支。自此我参加不少会议,加入了多个编委会,并撰写了文章与章节,包括《新剑桥伊斯兰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以及一些条目,包括博睿出版社(Brill)的《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三版(*Encyclopedia of Islam, Three*)。此外,我对一些研究问题仍然很感兴趣,其中有叙事策略,马穆鲁克编年史中的“文学化”(Literalization)倾向,以及一些较不知名及非传统风格的历史学家等。

另一方面,我与埃及库塞尔文书的邂逅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当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东方研究所团队的主要考古学家唐纳德·惠特科姆(Donald Whitcom)在上世纪 70 和 80 年代于埃及红海边的库塞尔进行了发掘工作,他知道我对手稿的兴趣,并请我看在他们命名为“长老之家”(The Sheikh's House)的地点发现的 100 多份碎纸片。我通过缩微胶片研读了这些残片,并获得埃及美国研究中心(ARCE)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资助,研究在开罗伊斯兰艺术

博物馆中的原抄件。这项工作的成果体现在《近东研究》(*JNES*)和 2004 年出版的专著中。同时,研究库塞尔文书这一非档案性质的资料汇编也激励我深入阿拉伯语文书史料、官方文书和档案等领域的研究。我关于这类主题的论文和百科全书条目是我对于阿拉伯语写作实践兴趣的不同程度的延伸。

这就牵扯到了第三个领域,即包括口头文学的中古阿拉伯语流行文化。埃及的皮影戏也属于此。这在许多方面都是阿拉伯文化研究专家梦寐以求的课题,而对我来说它几近于陈言所谓“乐在其中,不求回报”的工作。其目的是追溯并考察伊本·答尼亚尔(Ibn Daniyal, 卒于公元 1310 年)的生平和著作,此人是一位生活在开罗的眼科医生、诗人、剧作家、宫廷弄臣以及在其生活时代颇具争议的文化人。其狂放的文笔和怪诞行事好比王尔德,可以被视作是各自时代的离经叛道者。我把关于他的研究作为观察后蒙古时期埃及流行文化的切入点。核心史料是伊本·答尼亚尔的诗歌和皮影戏——这是奥斯曼帝国之前唯一留存下来的阿拉伯语戏剧文本。语文学的基础工作是艰巨的。伊本·答尼亚尔语言出名地费解——它是古典阿拉伯语和市井俚语的杂糅,又含有不少文学典故、双关、隐喻、行话以及切口。

至于理论方面讨论的中心议题则是伊本·答尼亚尔这个马穆鲁克诗人对市井俚语的大胆运用,以及皮影戏和其他叙述及表演形式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与在所谓“后古典时代”期间创作的阿拉伯语文学的“真实性”和“原创性”以及普遍认为的,阿拉伯文学传统中缺少如西方文化标准所定义的“戏剧”与“小说”的假说戚戚相关。我预期这个工作会是跨学科的,涉及埃及的皮影戏和中世纪中东下层社会的离经叛道的文化传统,同时期望它能有所建树。

关于我的职业道路的更长的回答,则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研究者这个问题有关。在这方面,两位东方学家弗朗茨·罗森塔尔(卒于 2003 年)和保罗·卡尔(卒于 1964 年)为我树立了榜样。两人都是典型的多面手——不仅兼跨多个领域,且在每个领域都做出了原创而重要的贡献。

罗森塔尔的圣经阿拉米语语法迄今为止仍是该领域的权威著作。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

(下转 10 版) ➡